

知人论世：韩婴诗学的再解读

靳 宝

【摘 要】韩婴诗学不仅在汉初得列官学，而且有《韩诗外传》存世。关于《韩诗外传》著述性质的讨论，无论是司马迁的“推《诗》之意”，还是班固的“推诗人之意”，关注点均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，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。“诗”与“诗人”的一字之差，其实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《韩诗外传》的不同理解，可视为探讨《韩诗外传》相关问题的学术参照。只有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，将之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，才能更加客观地评论《韩诗外传》，并充分认识韩婴诗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。韩婴质朴的学术品格、分明的处事风格，以及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，对《韩诗外传》的命名、特点、传播等诸多方面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韩婴 《韩诗外传》 知人论世 经学 地域文化

【作者简介】靳宝，历史学博士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。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6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A

【文章编号】2097 - 1125 (2023) 01 - 0107 - 18

韩婴诗学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而且在思想史、学术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和影响。关于韩婴诗学，学界主要是对现存《韩诗外传》加以探讨，在其版本、校勘、辑佚、著述性质、思想内涵、价值及意义等方面，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^① 不过，仍有一些问题尚无定论，诸如《韩

^① 参见马鸿雁：《〈韩诗外传〉研究综述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4年第4期，第41～44页；白云娇：《二十世纪以来〈韩诗外传〉研究述评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09年第5期，第117～123页。

诗外传》到底是解《诗》还是引《诗》；司马迁所言“推《诗》之意”与班固所讲“推诗人之意”有没有区别，如有区别，表现在哪里，原因又是什么；《韩诗外传》究竟源自荀子，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言，受《左传》和孟子的影响也很大；包括《韩诗外传》在内的韩婴诗学兴盛长存的主要因素是什么；等等。这些重要的诗学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本文立足于知人论世的方法，尝试对《韩诗外传》的命名、特点、传播作一些分析，以求方家指正。

一、误读“采杂说”而引发的诗学命题

南宋文学家洪迈曾对《韩诗外传》评论道：“观此章，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，以是说《诗》，可乎？其谬戾甚矣，它亦无足言。”^①这是因《韩诗外传》中存在背离儒家伦理德义的叙事，故而否定韩婴的诗学。同时代稍晚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言：“所存惟《外传》，而卷多于旧，盖多记杂说，不专解《诗》。果当时本书否也？”^②这是对存世的《韩诗外传》文本提出了质疑，并由“多记杂说”推导出“不专解《诗》”，虽没有完全否定《韩诗外传》的解《诗》性质，却是后世质疑《韩诗外传》著述性质的滥觞。明代王世贞明确提出《韩诗外传》乃引《诗》而非解《诗》，他说：“杂记夫子之绪言，与诸春秋战国之说家稍近于理者也。大抵引《诗》以证事，而非引事以明《诗》，故多浮泛不切，牵合可笑之语，盖驰骋胜而说《诗》之旨微矣。”^③在此论调的基础上，形成了后世批评《韩诗外传》的一种模式。清代四库馆臣对王世贞的这一认识作了进一步阐释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6《经部十六·诗类二》附录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“其书杂引古事古语，证以诗词，与经义不相比附，故曰《外传》。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。班固论三家之《诗》，称其‘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’，殆即指此类欤。”并案：“《汉志》以《韩外传》入《诗》类，盖与《内传》连类及之。王世贞称《外传》引《诗》以证事，非引事以明《诗》。其说至确。今《内传》解《诗》之说已亡，则《外传》已无关于《诗》义。徒以时代在毛萇以前，遂列为古来说《诗》之冠，使读《诗》者开卷之初，即不见本旨，于理殊为未协，以其舍《诗》类以外无可附丽，

① 洪迈撰，孔凡礼点校：《容斋随笔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313页。

② 陈振孙撰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：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2《诗类·韩诗外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35页。

③ 王世贞：《弇州四部稿》卷112《文部·读韩诗外传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80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763页。

今从《易纬》《尚书大传》之例，亦别缀于末简。”^① 在四库馆臣看来，班固在编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时之所以把《韩诗外传》列入《诗》类，是因为《韩诗外传》与《韩诗内传》的关联性。然而到清代编《四库全书》时，《韩诗内传》这一解《诗》作品已亡佚，自然不能仅根据时代将“无关于《诗》义”的《韩诗外传》列为《诗》之首，但《诗》类之外又无可附录，只好将《韩诗外传》编排在《诗》类之末。四库馆臣还提出，《韩诗外传》“无关于《诗》义”，也即非解《诗》之作，主要原因有两个：一是《韩诗外传》杂引古事古语，以《诗》来证之；二是《韩诗外传》所引古事古语与经义不合，与周秦时诸子所言也多有出入。同时，他们还认为，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言“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”，正是针对《韩诗外传》“无关于《诗》义”的一种表达。

可以说，关于《韩诗外传》为引《诗》而非解《诗》的著述性质界定，实由陈振孙“盖多记杂说，不专解《诗》”发其端，王世贞“大抵引《诗》以证事，而非引事以明《诗》”定其论，再到四库馆臣“无关于《诗》义”确其性。20世纪以来，学界对此意见不一。赞同者寻找相应材料加以论证，而反对者则爬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，进行逐一反驳。殊不知，他们围绕种种材料论证的这一命题，乃是由四库馆臣等对班固“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”的误读而引发的。

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言：“汉兴，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”如何理解这样一段记载与评述，首先要弄清“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”的所指对象问题。唐代颜师古注曰：“与不得已者，言皆不得也。三家者不得其真，而鲁最近之。”^② 清代王念孙亦云：“既言‘咸非其本义’，则无庸更言皆‘不得其真’。余谓‘与’者，‘如’也。‘不得已’者，必欲求其本义也。言三家说《诗》皆非其本义，如必求其本义，则鲁最为近之也。”^③ 虽然二人对“与”的字义解释不同，但都认为“咸非其本义”所指为鲁、齐、韩三家《诗》。而清人王先谦则曰：“与、已皆语词，颜说是也。但此谓齐、韩二传推演之词，皆非本义，不得其真耳，非并《鲁诗》言之。鲁最为近者，言齐、韩训故，亦各有取，惟鲁最优。颜谓三家皆不得，谬矣，既不得其真，何言最近乎？”^④ 在王先谦看来，“咸

① 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36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8、1709页。

③ 王念孙撰，徐炜君等点校：《读书杂志·汉书第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698页。

④ 班固撰，王先谦补注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17页。

非其本义”并不包括《鲁诗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“鲁最为近之”，指的是在“训故”方面，三家《诗》中唯《鲁诗》最优。这两种论断孰是孰非，还得从三家《诗》的具体情况和班固的经学思想来分析。

先看“或取《春秋》”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：“瑕丘江公受《谷梁春秋》及《诗》于鲁申公，传子至孙为博士。”^①这说明，鲁申公曾学习、传授《谷梁春秋》，《鲁诗》“取《春秋》”是完全有可能的。《鲁诗》既然曾采纳《谷梁春秋》，当然“非其本义”了。正如西汉经学家刘歆所言：“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，亲见夫子，而公羊、谷梁在七十子后，传闻之与亲见之，其详略不同。”^②而在班固看来，无论是《公羊春秋》还是《谷梁春秋》，甚至是《左氏春秋》，都与孔子《春秋经》本义有一定距离。

再看“采杂说”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曰：“序略，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，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。”^③班固曾批评司马迁作《史记》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，^④理由之一就是《史记》所引百家杂语和异传“颇谬于经”。所谓“异传”，其中就包括《韩诗外传》。《史记正义》曰：“太史公撰《史记》，言其协于六经异文，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，谦不敢比经艺也。异传，谓如丘明《春秋外传国语》、子夏《易传》、毛公《诗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伏生《尚书大传》之流也。”^⑤《史记索隐》亦有同样的解说。不难发现，在班固经学思想中，《韩诗外传》“颇谬于经”，自然“非其本义”了。

这样，我们就能理解“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”的真正内涵。在班固看来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都“非其本义”，相较而言，申公言《诗》更倾向于“取《春秋》”，《齐诗》与《韩诗》则更倾向于“采杂说”，故“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”。

既然《韩诗外传》“颇谬于经”“非其本义”，那么其性质就不应为“推《诗》之意”，^⑥即立足点在《诗》的文本意义，而只能是“推诗人之意”^⑦，即着眼于诗人作诗之意。但对司马迁而言，《史记》本就是“采杂

① 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7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36《楚元王传》附《刘歆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967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130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999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87下《扬雄传下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580页。《后汉书》卷40下《班彪列传下》范曄亦论曰：“彪、固讥迁，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”李贤注云：“言迁所是非皆与圣人乖谬，即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，轻仁义而贱守节是也。”（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386、1387页）

⑤ 《史记》卷130《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4000页。

⑥ 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8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3页。

说”的典型，他不会对《韩诗外传》“采杂说”有异议，故有“推《诗》之意”的评述。由此来看，“诗人”与“诗”的一字之差，是班固有意而为之，体现了他不同于司马迁的经学观念。

清人魏源对诗学的层次性曾作过阐释，他说：“夫《诗》有作《诗》者之心，而又有采《诗》、编《诗》者之心焉；有说《诗》者之义，而又有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者之义焉。”^① 如果从诗学文本意义上讲，第一个层次乃作《诗》者之心，作者写诗只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即《诗》之本义，没有什么特殊寓意，也无惩劝功能；第二个层次为采《诗》、编《诗》之心，虽仍以原《诗》为本，但已有了采者、编者的情与志，开始强调它的劝诫功能。而如果从发挥诗义的方式上讲，则有说《诗》与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之别。说《诗》是指针对《诗》的一种解说方式，而赋《诗》、引《诗》则指作者为更好地表达思想主旨而引用《诗》之材料来充实论证。

无论是司马迁的“推《诗》之意”，还是班固的“推诗人之意”，他们的关注点均为魏源所言的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，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。具体来讲，“推《诗》之意”对应的是“作《诗》者之心”，“推诗人之意”则对应的是“采《诗》、编《诗》者之心”。而王世贞、四库馆臣等对班固所言的“采杂说”却作了简单化理解，以此否定《韩诗外传》应有的诗义，进而引出《韩诗外传》乃引《诗》而非解《诗》这一诗学假命题。实际上，“推《诗》之意”与“推诗人之意”，只是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对《韩诗外传》的理解。这种理解可视为一种学术参照，但不能把它当作评论《韩诗外传》的唯一依据。故对《韩诗外传》的认识，还须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，放在区域文化史背景下作深入分析，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事实地对之加以评论。

二、“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”

关于韩婴其人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记载虽较为简略，但还是为我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。

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曰：

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乡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自是之后，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轅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^②

^① 魏源：《诗古微·齐鲁韩毛异同论中》，《魏源全集》第1册，岳麓书社2004年版，第129页。

^② 韩太傅，《史记索隐》注曰：“韩婴也。为常山王太傅也。”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2页。

同传又曰：

韩生者，燕人也。孝文帝时为博士，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。韩生推《诗》之意而为《内》《外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鲁间殊，然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自是之后，而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。^①

《汉书·儒林传》曰：

韩婴，燕人也。孝文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。婴推诗人之意，而作《内》《外传》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、鲁间殊，然归一也。淮南贲生受之。燕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。韩生亦以《易》授人，推《易》意而为之传。燕赵间好《诗》，故其《易》微，唯韩氏自传之。武帝时，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，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难也。后其孙商为博士。孝宣时，涿郡韩生其后也，以《易》征，待诏殿中，曰：“所受《易》即先太傅所传也。尝受《韩诗》，不如韩氏《易》深，太傅故专传之。”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《易》于孟喜，见涿韩生说《易》而好之，即更从受焉。^②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

汉兴，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三家皆列于学官。^③

同志又曰：

《诗经》二十八卷，鲁、齐、韩三家。^④

《韩故》三十六卷。《韩内传》四卷。《韩外传》六卷。《韩说》四十一卷。^⑤

以上记述包含四个方面的文本信息及文化内涵。

第一，关于韩婴的籍贯，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和《汉书·儒林传》均言“燕人”，此说较笼统，或许与燕国建置变动频繁有关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又言“孝宣时，涿郡韩生其后也”，查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：“（元凤元年）三月，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，人五十匹，遣归。”^⑥陈直认

① 常山王，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注曰：“宪王舜也。”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8~3769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3~3614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8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7页。

⑤ 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1708页。

⑥ 《汉书》卷7《昭帝纪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225页。

为，“涿郡韩生”当即韩福。^①涿郡，西汉高祖时置，治涿县（今河北涿州市），辖境包括今北京房山区以南，河北易县、清苑以东，安平、河间以北，霸州、任丘以西地区。明嘉靖年间《河间府志》载：“任丘，本燕地，今其地有韩婴墓见存。”^②因此说韩婴为燕国涿郡人，是没有问题的。

第二，司马迁记录韩婴在汉文帝时为博士，汉景帝时则为常山王太傅，^③这一变化反映了什么？清末民初崔适对此就有所关注。他称言：“上文已云‘言《诗》于燕自韩生’，此仍不出言《诗》之意，绝无与于朝廷之事，与申、辕殊，何以传为？下仿此。其云‘韩生推《诗》之意而为《内外传》数万言’，岂申、辕无章句乎？彼不言而此言之，非例也。此言体似《七略》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衍之，后人据以窜入此传也。今删。”^④崔适把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关于韩婴的这段记载看作后人附会窜入，显然不可信。但他认为韩婴与申公、辕固生的传记在叙事上有所不同，尤其是前者没有提及任何与朝廷有关之事，则对我们分析韩婴其人其事有启示意义，故可从《史记》对申公、辕固生的记述中略窥一二。

申公作为鲁人，坚持习《诗》、传《诗》，先是遭到楚王刘郢客之子刘戊的排斥，不得已退居家乡教授。后汉武帝即位，他应召入仕，为太中大夫，参与明堂议事。然而，因窦太后阻扰，不仅明堂议事无法进行，而且申公两大弟子王臧、赵绾被迫自杀，申公自己也以疾免归鲁，数年后去世。辕

① 参见陈直：《汉书新证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，第41页。杨树达也持相同观点，参见氏著：《汉书窥管》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，第610页。

② 郜相修，樊深纂：《河间府志》卷24《人物志·韩婴》，明嘉靖十九年刻本，第1页a。

③ 《论衡·骨相篇》载：“韩太傅为诸生时，之市，借相工五十钱，与之俱入壁雍之中，相壁雍弟子谁当贵者。相工指倪宽曰：‘彼生当贵，秩至三公。’韩生谢遣相工，通刺倪宽，结胶漆之交，尽筋力之敬，徙舍从宽，深自附纳之。宽尝甚病，韩生养视如仆状，恩深逾于骨肉。后名闻于天下。”黄晖注曰：“此非韩婴，婴以景帝时为常山太傅，孝文时已为博士，不得与宽同学。其人未详。”（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119页）姚振宗《汉书艺文志条理》卷1之上云：“按韩婴遗事不概见，《论衡》言擢用至太傅，在倪宽为御史大夫之后，是武帝元封以后之事。与史言景帝时为太傅不合。或武帝时又为常山王傅，史略之与？”（转引自屈守元笺疏：《韩诗外传笺疏》，巴蜀书社2011年版，第511~512页）杨树达在注释刘歆所言“在汉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”时，根据王充《论衡》这一记载而否定韩婴为文帝时博士（参见杨树达：《汉书窥管》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，第263~264页）。然而从生活年代来说，司马迁与韩婴最近，他不可能不了解韩婴何时为博士，这一点应该不会误记。而王充《论衡》所载“相工为倪宽看相”一事，传说演绎色彩突出，实证性叙事不够。故相较而言，司马迁所记还是可信的。《汉纪》卷25《孝成皇帝纪二》亦载：“《诗》始自鲁申公作诂训；燕人韩婴为文帝博士，作《诗外传》；齐人辕固生为景帝博士，亦作《诗外》、《内传》。由是有鲁、韩、齐之学。”（荀悦著，张烈点校：《两汉纪·〈汉纪〉》，中华书局2002年版，第435页）

④ 崔适著，张烈点校：《史记探源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16页。

固生的命运同样坎坷。在景帝时他虽因治《诗》而为博士，但亦遭到窦太后刁难，失去博士官。景帝“以固为廉直”，^①拜固为清河王太傅，后又病免。

申公与辕固生坎坷的学术经历和政治命运，除了同窦太后好黄老言、排斥儒学有关外，还与他们的学术文化品格密不可分。当武帝向申公问政时，申公却作了这样的回答：“为治者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。”司马迁接着记述道：“是时天子方好文词，见申公对，默然。”^②是知由战国末期历秦而入汉的申公，缘于其质朴的学术追求，不会像叔孙通那样“变通”，^③这决定了他无法适应新的政治需要。辕固生亦如此。窦太后好《老子》，召辕固生问学。辕固生直言：“此是家人言耳。”窦太后很愤怒，辕固生因此差点丧失性命。武帝即位之初，辕固生虽以贤良得征，但受到诸多喜好阿谀奉承之儒士的诋毁和排挤。当他在朝上发现公孙弘侧目视己时，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！”^④申公和辕固生这种正直、务实的学术文化品格，对他们的人生道路必将产生重要影响。

韩婴同样如此。辕固生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经历，与韩婴正同。《史记》虽没有详细记述韩婴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过程，但这本身便蕴含着其经历同样坎坷的历史信息。汉景帝将韩婴派往常山国，给“骄怠多淫，数犯禁”^⑤的刘舜当太傅，显然不是一种升迁式待遇，而是潜在的贬抑。很有可能，韩婴也遭到了窦太后的刁难，但他同样坚持“务正学”而不“曲学以阿世”，具有正直的学术文化品格。清人杨绍文就认为：“申公、韩生、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。”^⑥

相对而言，韩婴在武帝时期有比申公、辕固生更好的政治命运。《汉书·夏侯始昌传》曰：“夏侯始昌，鲁人也。通《五经》，以《齐诗》、《尚书》教授。自董仲舒、韩婴死后，武帝得始昌，甚重之。”^⑦这说明韩婴晚年曾受到武帝的尊崇。又武帝时，韩婴之孙韩商为博士。宣帝时，韩婴后人韩福“以《易》征，待诏殿中”。显然，韩婴及其家族的这种政治命运，是申公、辕固生难以享有的。之所以辕固生和韩婴仕宦经历几乎相同，司马迁记述时却详略不同，是因为从总体上看，韩婴虽然也经历过一些坎坷，但他

① 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8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6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99《叔孙通传》太史公曰：“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，进退与时变化，卒为汉家儒宗。”（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283页）

④ 《史记》卷121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3768页。

⑤ 《史记》卷59《五宗世家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2543页。

⑥ 杨绍文：《云在文稿·史记儒林传论》，转引自杨燕起、陈可青、赖长扬编：《历代名家评〈史记〉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699页。

⑦ 《汉书》卷75《夏侯始昌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154页。

的结局要好得多（尽管没有直接体现在韩婴传记中），这种好的结局正是由于韩婴在晚年受到了武帝尊崇，而武帝对韩婴的尊崇又为后来其子孙相继入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这样的不同，或与韩婴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关。

第三，班固记录韩婴曾经与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争论，至于讨论的具体内容，则无法得知。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韩婴在与董仲舒辩论中体现的“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”这一特点。颜师古注曰：“悍，勇锐。”^①所谓“其人精悍”，更多指向学术品格，体现为勇于表达、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。而所谓“处事分明”，则更多指向为人处事风格，表现为待人待事态度分明、有尺度。韩婴能与大儒董仲舒辩于汉武帝面前，正说明韩婴在当时确实有着受到尊崇的学术地位。“仲舒不能难也”，更显示出韩婴具有的突出能力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精悍的学术品格和分明的处事风格。

第四，除《韩诗》外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还记录有《韩故》《韩内传》《韩外传》《韩说》。《韩内传》《韩外传》自然为韩婴所作，那么《韩故》与《韩说》是韩婴还是其后人所作？对于《韩故》，王先谦认为，“此韩婴自为本经训故，以别于《内外传》者，故志首列之。或以为弟子作，非也”。^②这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言“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”并不一致。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《齐诗》著作没有《齐故》，而有《齐后氏故》《齐孙氏故》，《鲁诗》著作则有《鲁故》。再从《齐后氏故》《齐孙氏故》的命名来看，显然“齐故”类诗学著作应为辕固生弟子或再传弟子所作。依此类推，《韩故》很有可能也是韩婴后人所作，尤以韩商的可能性较大。关于《韩说》，《汉书·王吉传》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匪风发兮，匪车揭兮，顾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’说曰：是非古之风也，发发者；是非古之车也，揭揭者。盖伤之也。”^③杨树达注《韩说》时据此言：“按吉学《韩诗》，所引《诗说》，殆即此书也。”^④显然，《韩说》并非王吉等习者所作。或许《韩说》与《韩故》一样，皆出自韩商之手。徐复观就指出，《韩故》与《韩说》为韩婴孙韩商为博士时集录。^⑤概言之，韩婴以28卷《诗经》为立足点，撰有《韩诗内传》与《韩诗外传》。由于如今存世的仅有《韩诗外传》，故只能通过《韩诗外传》来探究韩婴诗学的种种面相。而韩婴的学术品格、处事风格以及他所处的燕赵地域的文化对《韩诗外传》的命名、特点及传播的影响，值得深入考察。

① 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4页。

② 班固撰，王先谦补注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15页。

③ 《汉书》卷72《王吉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058页。

④ 杨树达：《汉书窥管》，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，第183页。

⑤ 参见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3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页。

三、“其语颇与齐鲁间殊”

《史记》提到韩婴作《韩诗内传》《韩诗外传》数万言，“其语颇与齐鲁间殊，然其归一也”，《汉书》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述。这既道出了《韩诗内传》《韩诗外传》的特点，即在语言风格上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质，亦指出了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的宗旨是相同的。正如王先谦所言：“所谓‘其归一’者，谓三家《诗》言大旨不相悖耳。”^①

《韩诗外传》的特质，具体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
其一，外在形式上，《韩诗外传》以姓氏定名。这一点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就能看出。《韩诗外传》因何以姓氏定名？宋人王应麟云：“《儒林传》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公培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。齐、鲁以其国所传，皆众人之说也。毛、韩以其姓所传，乃专门之学也。”^②这是说以姓氏为名的，乃一家之学；以地域命名的，乃众人之说。这种从学说是否具有独创性来分析命名的认识并不准确，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均可成一家之言。^③程元敏从另一种思路对此加以析述，他指出：“鲁为孔子故里，夫子经学教化，鲁学早成显派；齐有稷下，诸家讲经，游学其间，次鲁学而亦早为经学重镇。战国中晚叶，论经学者莫不竞以齐鲁派为师为荣。故言《诗》则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，言《论语》则《鲁论》、《齐论》，而韩婴、毛公讲论于燕、赵、河间国，学风非盛，远逊齐、鲁，故不足以《诗》学大宗——《燕诗》、《赵诗》或《河间诗》而尊称之也。”^④这是从地域学术文化影响力来谈《韩诗外传》命名的原因，更有说服力。

至于《韩诗外传》命名的时间问题，钱穆曾指出：“窃疑《诗》分齐、鲁、韩三家，其说亦后起，故司马迁为《史记》，尚无《齐诗》、《鲁诗》、《韩诗》之名……至班氏《汉书》则确谓之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焉。是三家《诗》之派分，亦属后起。”至于具体时间，钱穆因“石渠议奏不及《诗》”而推测“《诗》分三家，疑且在石渠后矣”。^⑤赵茂林对钱穆这一推

① 王先谦撰，吴格点校：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“诗三家义集疏序例”，第5页。

② 王应麟：《汉艺文志考证》卷2《诗·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675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21页。

③ 参见赵茂林：《汉代四家〈诗〉命名考辨》，《学术论坛》2010年第9期，第103～108页。

④ 程元敏：《诗序新考》，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，第24页。

⑤ 钱穆：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，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，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，第215、216页。

测进行了辨析，认为三家《诗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之后、石渠阁会议之前。^① 如果综合来看，三家《诗》命名可能并非同时，就《韩诗》《韩诗内传》《韩诗外传》来讲，说武帝时韩商博士定其名，亦未尝不可。

其二，内容叙事上，《韩诗外传》更多保留了先秦文风、继承了先秦诗学精神。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言《韩诗外传》“虽非解经之深者，然文辞清婉，有先秦风”。^② 元人钱惟善《韩诗外传序》亦称：“然观《外传》虽非其解经之详，断章取义，要有合于孔门商、赐言诗之旨。况文辞清婉，有先秦风，学者安得不崇尚之？”^③ 这是就文风而言，属于形式的层面，更深一层则表现在《韩诗外传》对先秦诗学精神的继承上。正如学者所言：“《韩诗外传》的解《诗》与先秦传《诗》方式一脉相承。”^④ 这可从韩婴受所在地域的文化影响，其诗学保留了更多“汉代学术生成”^⑤ 之前的先秦学术文化特征来加以说明。

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《孔子诗论》，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看到孔子诗学思想的丰富性，即孔子也重视“情”（自然的情感）。韩婴同样从《诗》中感受到“情”的真切，“情”对人们生活和文化发源的重要作用，“情”的道德感、美感等高级内容，因而力排众说，为“情”正名。^⑥ 可以说，《孔子诗论》与《韩诗外传》存在学术关联，即二者都涉及以性情、情志论诗。^⑦ 故有学者提出，《韩诗外传》的情性论是对七十子的一次回归，在诗学与性命道学之间架起了桥梁，并可能借助说《诗》的方式，推动了诗学话语里“情”的正当化。^⑧

《韩诗外传》的这一特质，得益于燕赵文化的孕育及影响。韩婴为燕地涿郡人，近于赵地，易受到三晋文化的影响，特别是赵文化的浸染。有人推测，韩婴曾游学河间，由河间举荐为博士。^⑨ 如果从明嘉靖《河间府志》所

① 参见赵茂林：《汉代四家〈诗〉命名考辨》，《学术论坛》2010年第9期，第106～108页。

② 晁公武撰，孙猛校证：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64页。

③ 转引自屈守元笺疏：《韩诗外传笺疏》，巴蜀书社2011年版，第533页。

④ 房瑞丽：《〈韩诗外传〉与先秦〈诗〉学渊源关系探略》，《北方论丛》2012年第1期，第121页。

⑤ 参见李振宏：《论“先秦学术体系”的汉代生成》，《河南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8年第2期，第1～12页。

⑥ 参见艾春明：《〈韩诗外传〉情性论与〈性自命出〉的渊源》，《东北师大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6年第4期，第95页。

⑦ 参见辛慧：《〈孔子诗论〉与〈韩诗外传〉论诗的学术关联》，《现代语文》（文学研究版）2009年第11期，第8页。

⑧ 参见艾春明：《〈韩诗外传〉情性论与〈性自命出〉的渊源》，《东北师大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6年第4期，第91页。

⑨ 参见喻彦彦：《河间献王刘德学术述论》，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7年，第37页。

载韩婴之墓就在河间献王城附近来看,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。其实,早在战国时期,燕昭王就“曾游三晋,其思想观念必然受到三晋文化的影响,故有筑馆招贤之举”。^①再从燕赵文化固有的一体性来讲,这也顺理成章。卢云言:“燕地西汉时出人出书有限,大体说来,其学术文化的构成与三晋地区类似,主要为儒家、纵横家等。”^②韩婴诗学体现出来的厚重质朴的治学风格,与河间献王刘德相似。反过来,河间献王崇尚的以重训诂名物、阐释史实为主要特色的古文经学,以及他坚持的儒家的仁和义,即孔儒的真精神,^③对韩婴也有一定影响。当然,燕地这一特殊区域的文化特色,也使得韩婴诗学易保留一些真实而原始的思想内容。刘跃进就指出:“如果从地理上寻求原因,大约是交往受到较多的限制,所以这个地区的学术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系统,反而保留了许多先秦以来的学术资源,因而对于后代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影响。”^④

关于“其语颇与齐鲁间殊”,金德建曾分析道:

在这轻轻的一句当中,似乎表示出韩婴的诗说有它自己的地域渊源关系,跟“齐地”“鲁地”是有些两样。这一点实在是韩婴诗学的成功之处,不容随便忽视。鲁地原来是所谓儒者之邦,自然有所凭借,会产生自成一派诗说的趋势,不是别的地方所能及。齐地原来也有过迂怪之说,因此后来《齐诗》里,颇多采用纬书,有“五际六情”等很别致的说法。可是韩婴的籍贯却在偏僻的燕地,向来似乎并没有以传诗著名的人物或者事迹可寻。那末所谓地域方面的渊源关系,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和燕比邻的赵地了。^⑤

于是,金先生提出韩婴的诗学来源于荀卿。在对“燕、赵间言《诗》者由韩生”的解析中,他又说:“韩婴原本是燕地的人,而讲《韩诗》的学说系统流传,却要并提到‘燕、赵’。在《史记》所说的这句话里,透露出来一点消息,所谓韩婴的《诗》学派别,渊源对象的确另外还有‘赵地’。现在把荀卿来安置在韩婴的前头,未始不符合于司马迁的见解。”^⑥以往虽有人提出《韩诗外传》来源于荀子,但基本是以《韩诗外传》征引《荀子》最

① 邢培顺:《碣石学宫考论》,《滨州学院学报》2009年第1期,第60页。

② 卢云:《汉晋文化地理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,第45页。

③ 参见汪春泓:《关于〈史记·五宗世家〉之“河间献王”事迹疏证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0年第5期,第83页。

④ 刘跃进:《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,第185页。

⑤ 金德建:《〈韩诗内外传〉的流传及其渊源》,《司马迁所见书考》,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,第52页。

⑥ 金德建:《〈韩诗内外传〉的流传及其渊源》,《司马迁所见书考》,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,第56页。

多为依据。^① 如果加上地域文化这一层解释，那么在论证上就更为充实了。

同时，我们在讨论《韩诗外传》来源问题时，也不能忽略燕赵诗学传统的影响。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是古老的文人荟萃之地、诗歌流传之邦。^② 《诗经》这部诗歌总集中有一些动人的诗篇，最初就来自燕赵大地。《国风》中的《邶风》和《鄘风》以及《卫风》中的部分诗篇，就是现存最古老的黄河以北地区的民歌。郑玄《诗谱》言：“邶、鄘、卫者，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，其封域在《禹贡》冀州太行之东，北逾衡漳，东及兖州桑土之野。周武王伐纣，以其京师，封纣子武庚为殷后。庶殷顽民，被纣化日久，未可以建诸侯，乃三分其地置三监，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尹而教之。自纣城而北谓之邶，南谓之鄘，东谓之卫。”^③ 王国维曾根据出土实物进行考证，认为邶即燕。^④ 因此我们“无须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去强为区分”，可以把上述诗篇看作“产生与流传在自豫北至燕赵这一片毗连的大平原上的民间诗歌”。^⑤ 换言之，燕赵大地是《诗经》创作地之一。

燕国方言系统在韩婴诗学中亦有一定呈现。如《韩诗外传》卷2第13章云：“崔杼谓晏子曰：‘子与我，吾将与子分国。子不与我，杀子。’”^⑥ 相似内容亦见于《新序·义勇》：“崔杼谓晏子曰：‘子与我，我与子分国，

① 如清人汪中指出：“其引《荀卿子》以说《诗》者四十有四。由是言之，《韩诗》，《荀卿子》之别子也。”（王先谦撰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：《荀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“考证下”，第21页）清代辑佚大家严可均也认为：“《韩诗外传》引荀子以说《诗》者四十余事，是韩婴亦荀子私淑弟子也。”（徐世昌等编纂，沈芝盈、梁运华点校：《清儒学案》卷119《铁桥学案·荀子当从祀议》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4725页）这一认识遂成为影响很深的传统观点，至今仍有不少学者遵其说。如刘立志提出：“虽然汪、严立论不免失之牵强，但《韩诗》与荀子有渊源关系，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。”（刘立志：《汉代〈诗经〉学史论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36~37页）即使是那些不认可韩婴师承荀子的学者，也基本不否认荀子对韩婴诗学的重要影响。如徐复观认为，西汉四家诗同出一源，但韩婴在《韩诗外传》中“共引用《荀子》凡五十四次，其深受荀子影响，可无疑问”。（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3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5页）

② 参见夏传才：《燕赵——〈诗经〉流传和研究的故乡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83年第4期，第55页。

③ 《毛诗正义》卷2《国风·邶鄘卫谱》，《十三经注疏：清嘉庆刊本》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，第622页。

④ 参见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卷18《史林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885页。

⑤ 夏传才：《燕赵——〈诗经〉流传和研究的故乡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1983年第4期，第56页。

⑥ 韩婴撰，许维遹校释：《韩诗外传集释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46页。

子不吾与，吾将杀子。’”^①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认为，以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为代表的鲁方言，具有这样的语法规则：“在否定句中，宾语为代名词时，置于动词之前；宾语为名词时，位于动词之后。”^②《新序》的“不吾与”沿袭了这一规则，而《韩诗外传》则没有。有学者就此指出：“如果不是后代流传过程中修改的结果，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韩婴使用的燕国方言就没有这个规则，或者说汉初的北方语言是《韩诗外传》的形态，而刘向只不过因为个人经历与鲁地有染较多（刘向是楚元王四世孙，元王封地也是刘向生长地彭城离曲阜很近，当在同一方言区），《新序》的讲法是鲁方言在汉初的遗留。”^③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，可作为燕赵地域文化对韩婴诗学影响的一个佐证。

四、“始于韩婴，而盛于王吉”

关于《韩诗》（包括《韩诗外传》）的传播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，《韩诗》在西汉时期相对不显，至东汉则盛极一时。清人唐晏就言：“大抵《鲁诗》行于西汉，而《韩诗》行于东汉，二家互为盛衰。故《韩诗内传》至六朝尚存，亦以习之者多也。”^④仅从《韩诗》总体的传习情况来看，确实东汉盛于西汉。据唐晏所列，东汉至三国共有41人传习《韩诗》，而西汉仅有14人。^⑤但如果把专门传授者和普通学习者分开看，则大不一样。左洪涛统计两汉《韩诗》传授者共20人，其中西汉时期有12人，历经6代传授系统，而东汉有8人，历经4代传授系统。^⑥故简单说《韩诗》盛于东汉，并不确切。东汉《韩诗》传授者流传下来或有记录的著述，明显要多于西汉，这或许是造成学者普遍认为《韩诗》兴盛于东汉的一个因素。不过，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西汉《韩诗》传授者的工作，可能他们更多采取的是口授相传的形式。

清人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朱悼云：“《韩诗》始于韩婴，而盛于王

① 刘向编著，石光瑛校释，陈新整理：《新序校释》卷8《义勇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1022页。

② [日]太田辰夫：《汉语史通考》，江蓝生、白维国译，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7页。

③ 艾春明：《〈韩诗外传〉研究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08页。

④ 唐晏著，吴东民点校：《两汉三国学案》卷6《诗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99页。

⑤ 参见唐晏著，吴东民点校：《两汉三国学案》卷5《诗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12~213页。

⑥ 参见左洪涛：《〈韩诗〉传授人及学者考》，《文献》2010年第2期，第26~29页。

吉。”^①王吉，西汉宣、元时期名儒，曾从蔡义学习《韩诗》。史载：“久之，诏求能为《韩诗》者，征义待诏，久不进见。义上疏曰：‘臣山东草莱之人，行能亡所比，容貌不及众，然而不弃人伦者，窃以闻道于先师，自托于经术也。愿赐清闲之燕，得尽精思于前。’上召见义，说《诗》，甚说之，擢为光禄大夫、给事中，进授昭帝。”^②这说明汉昭帝以前，《韩诗》虽列为学官，但传习者少，以致朝廷需要时“能为《韩诗》者”非“求”而莫能得。^③再结合“《韩诗》有王、食、长孙之学……徒众尤盛”^④的情状，说《韩诗》从王吉开始走向兴盛，是没有问题的。

江乾益提出：“自韩生为《诗》内、外传，《韩诗》之传不绝，其盛时有二：一则《韩诗》之有王、食、长孙之学也，一则薛氏之学也。皆徒众至盛，传业不绝。”^⑤这是比较客观的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：“《齐诗》，魏代已亡；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；《韩诗》虽存，无传之者。”^⑥王先谦补充曰：“至南宋后，《韩诗》亦亡，独存《外传》。”^⑦从长时段和诗学整体而言，《韩诗》（尤其是其中的《韩诗外传》）的生命力的确比较旺盛。

《韩诗》盛于王吉，特别是东汉时期依然兴盛，并且传承久远，原因何在？有学者把三家《诗》在东汉的兴衰与王莽代汉、东汉崇信讖纬相联系，认为王莽代汉期间三家《诗》学者的不同政治倾向，是影响三家《诗》在东汉命运的重要因素——反对新莽的《鲁诗》《韩诗》学派，获得东汉统治者的优待；拥护新莽的《齐诗》学派，则受到东汉统治者的冷遇。东汉学术崇信讖纬的风尚与《韩诗》学者善言讖纬相合，故《韩诗》取代《齐诗》而盛于东汉。^⑧这一分析值得商榷。

活跃于两汉之际的伏氏家族，世代传授《齐诗》。伏理受《诗》于匡衡，由是《齐诗》有匡、伏之学。^⑨伏理后成为名儒，“以《诗》授成帝”。^⑩东汉时，伏理之子伏黯“以明《齐诗》，改定章句，作《解说》九

① 朱彝尊：《经义考》卷100《诗·汉志二十八卷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678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330页。

② 《汉书》卷66《蔡义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2898页。

③ 参见俞艳庭：《王莽新政与两汉三家〈诗〉学之兴衰易势》，《理论学刊》2010年第9期，第91页。

④ 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4页。

⑤ 江乾益：《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研究》，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45页。

⑥ 《隋书》卷32《经籍志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918页。

⑦ 班固撰，王先谦补注：《汉书补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915页。

⑧ 参见俞艳庭：《两汉政治与三家〈诗〉的命运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5期，第89~104页。

⑨ 参见《汉书》卷88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13页。

⑩ 《后汉书》卷26《伏湛传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893页。

篇，位至光禄勋”。伏理之孙伏恭少传伏黯之学，“省减浮辞，定为二十万言”，为博士，后任常山太守、司空等职，“儒者以为荣”。^①这说明东汉时《齐诗》学者并没有受到统治者冷遇。

关于《韩诗》传授者言讖纬与其学派兴盛之间的关系，同样没有与之对应的必然传承。薛汉虽善说灾异图讖，但他的诗学弟子及再传弟子中，没有一个被提及言灾异图讖。严格来讲，东汉习《韩诗》者中仅有薛汉、郅恽、廖扶、唐檀、公沙穆、杜琼6人言讖纬，占东汉习《韩诗》人数的19%。^②如果从东汉时期讖纬尤为盛行这一大环境来看，恰恰说明《韩诗》学者受讖纬影响较弱。

其实，探讨《韩诗》，特别是《韩诗外传》兴盛长存的主要原因，还须着眼于韩婴自身及其所在地域文化之影响。

第一，韩婴的节义观是促使《韩诗外传》兴盛的重要因素。刘咸炘言：“太傅燕人，燕人慷慨，故太傅言气节极有力。”^③徐复观在探讨《韩诗外传》思想时，把“士节”问题看作韩婴强调的四大问题之一。^④这恰好与东汉社会尚名节的风气一拍即合，^⑤自然得到君臣上下的欣赏和传习，《韩诗外传》的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如召驯少习《韩诗》，以志义闻于世，乡里号之曰“德行恂召伯春”。章帝时，“帝嘉其义学，恩宠甚崇”。^⑥又杨仁“建武中，诣师学习《韩诗》，明帝时“引见，问当世政迹。仁对以宽和任贤，抑黜骄威为先。又上便宜十二事，皆当世急务。帝嘉之，赐以缣钱”。及明帝崩，“时诸马贵盛，各争欲入宫。仁被甲持戟，严勒门卫，莫敢轻进者”。章帝既立，“诸马共谮仁刻峻，帝知其忠，愈善之，拜什邡令。宽惠为政，劝课掾史弟子，悉令就学。其有通明经术者，显之右署，或贡之朝，由是义学大兴”。^⑦正如学者所言：“虽然在朝廷眼里《鲁诗》是魁首，但在‘儒林’看来，《韩诗》更能代表东汉的时代特色，所以东汉研习《韩诗》

① 《后汉书》卷79下《儒林列传下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2571页。

② 据左洪涛统计，东汉时传授（指有其明确师承关系）和学习《韩诗》者共31人。参见氏著：《〈韩诗〉传授人及学者考》，《文献》2010年第2期，第28~32页。

③ 刘咸炘著，黄曙辉编校：《刘咸炘学术论集·子学编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47页。

④ 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3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2~24页。

⑤ 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5专列“东汉尚名节”一节，并指出：“盖当时荐举征辟，必采名誉，故凡可以得名者，必全力赴之，好为苟难，遂成风俗。”赵翼著，王树民校证：《廿二史劄记校证》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，第105页。

⑥ 《后汉书》卷79下《儒林列传下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2573页。

⑦ 《后汉书》卷79下《儒林列传下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2574页。

者大有人在。”^①

第二，《韩诗外传》在表达方式上重视通俗性、故事性特点，也利于其传播。韩婴以《易》授人，但因燕赵之士更热衷于传诵诗学，致使《韩易》在社会层面上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，只能在韩氏家族内自传。宣帝时，韩福以《易》被征召，在他看来，《韩诗》不如《韩易》深刻，司隶校尉盖宽饶也正是体会到《韩易》的深刻，才改从韩福习《易》。这似乎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，即《韩诗》在燕赵民间受欢迎，正说明《韩诗外传》具有通俗性与故事性特点，而《韩易》则因太偏于学术化，内涵深刻，哲理性过强，故在燕赵民间无法得到传承。^②徐复观指出，《韩诗外传》把自己的思想主要通过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。将古人的言行作为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，这属于《春秋》的系统，或可称之为史学家的语言系统，也是诸子百家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。^③当然，这样的形式并非韩婴独创，先秦以来已有之，但受此形式影响最为突出的则是韩婴的《韩诗外传》，其主要意义在于“加强思想在现实上的功用性与通俗性”，尤其是“加强对统治集团的说服力”。^④尽管汉代三家《诗》都将对古代诗歌的解说与现实的政治教化紧密结合，但表现形式各有特色：《齐诗》最善于附会阴阳五行学说，不免流于荒诞，而《韩诗》则喜欢把对诗歌的解释与历史相结合。^⑤

此外，重要政治人物的推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。如光武帝令郅恽授明帝《韩诗》；梁商少持《韩诗》，后以外戚身份为大将军。统治阶层对《韩诗》的研习，为韩婴诗学的兴盛增添了政治动力。

学术文化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空间框架中展开的，由于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、经济发展水平、政治状况与社会传统，学术文化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。^⑥《韩诗外传》的形成、传承及呈现出的独特性，除了与韩婴自身的因素有关外，也离不开燕赵地域文化的影响。所以有学者说：“《鲁诗》过于本份，自然易于僵化；《齐诗》过于玄虚，自然难以承传；而《韩诗》所具有的晋学、鲁学与齐学的混合性格，以及其对《诗》作为文学的鲜活性与作为经学的经典性的保持，使其具有了多重生存能力，因而不仅在东汉神

① 王承略：《四家〈诗〉在汉代不同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》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与研究中心编：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》第3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50页。

② 当然，这与《易》本身的难度超过《诗》也有一定关系。

③ 参见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3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~4页。

④ 徐复观：《两汉思想史》第3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页。

⑤ 参见周桂钿、李祥俊：《中国学术通史（秦汉卷）》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39页。

⑥ 参见卢云：《汉晋文化地理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“绪论”，第1~3页。

学思潮中能得以盛行，即使在《毛诗》理性说诗的冲击下，也未即刻倒下。传授之盛，逾于其它各家。”^①

五、结语

韩婴诗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、思想史、学术史上都值得关注，《韩诗外传》更是流传至今的一部珍贵的诗学文献。但长期以来，学者对《韩诗外传》存在误解。明代王世贞、清代四库馆臣等对班固所言的“采杂说”作了简单化理解，以此否定《韩诗外传》应有的诗义，从而引出《韩诗外传》乃引《诗》而非解《诗》这一诗学假命题。实际上，无论是“推《诗》之意”，还是“推诗人之意”，皆为司马迁与班固在各自经学观下所作的评述，他们的着眼点在文本意义上的诗学层次，而不是发挥诗义方式上的诗学层次。归根结底，对《韩诗外传》的认识，还须着眼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，以及汉代区域文化史背景。

韩婴为燕国涿郡人，由博士到王国太傅的政治身份转变，似乎说明他的人生经历并非一帆风顺。究其原因，除了政治因素外，还与他质朴的学术品格与分明的处事风格息息相关。这种学术品格和处事风格反过来影响了《韩诗外传》的命名、特点及传播。

《韩诗外传》有其自身特质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《韩诗外传》以姓氏定名；二是《韩诗外传》更多地保留了先秦文风、继承了先秦诗学精神。这样的特质，得益于包括诗学传统在内的燕赵地域文化的滋养。而《韩诗外传》的兴盛长存，同样离不开韩婴自身与燕赵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推动。韩婴受燕赵地域文化影响而具有的节义观，以及《韩诗外传》在表达方式上重视通俗性、故事性的特点，都有利于韩婴诗学的传授与传播。

《韩诗外传》是一部立足于28卷《诗经》的诗学阐释作品，它是韩婴整个诗学系统的重要内容，对它的进一步探讨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韩婴诗学面貌的认识。质言之，只有把《韩诗外传》与韩婴其人及其诗学系统、所在地域文化相联系，并参照汉代史学家的评论，才能更接近事实地评述它。

(责任编辑：张梦晗)

^① 刘毓庆、郭万金：《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》，《山西大同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1期，第43页。